

# 近代中日新词研究的方法和问题点

## 1. 引言

我们都知道日语中存在着大量的“汉语词”，这里所说的“汉语词”，既有源自中文的——自古以来吸收中华文明的产物，也有日本为表达新生事物而独自创造的。随着近代以后两国文化交流的深度进展，这类“汉语词”往来于两国之间，构成了独具特色的中日同形词，于是就有人会问：这些同形词中哪些是出自中文的，而哪些又是来源于日语的呢？同样，站在日语研究的角度来看，一个主要方向就是搞清楚哪些“汉语词”是中文本身固有的，或在日语语境中变化产生的，哪些是日本独自发明创造的，而且后来还传到中国，成为中文的一个组成部分。

近代日语有一个“汉语词”剧增的时期，但在解释这一现象时，以往多以昙花一现来形容之，但实际的杂志用语调查却告诉我们明治时期的1874-1909期间“汉语词”均占到70%以上，只有进入大正时代其势头才开始减弱。对这一现象的成因，过去也多认为是近代日本吸收西学而产生的“新汉语”所导致的，但实际上却对其内涵没有做过具体的分析，此文旨在阐明这一概念的误导所引起的混乱，并对这类“新汉语”的归属及词源验证法提出质疑。至今为止，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各种议论本质上都是基于一种“文化创造的优越感”<sup>1</sup>。特别是就“新汉语”词源问题，动辄就会被一种国粹主义思想所利用。事实上，日语中的“新汉语”的词源调查的意义不单在于文化创造的优先权上，更多的是在向西方文化接轨过程中率先实现现代化进程的一种民族自尊心的表现。我们知道近代日本的知识分子面对西方概念绞尽脑汁创造出诸如「哲学、人格、科学、美学」等“新汉语”，而且这些词也的确作为新概念传入中国和朝鲜半岛。基于这种事实，中日双方的媒体都喜欢议论这种题材，日本方面愿意夸大其范围，而国人则喜好在古典汉籍里寻根问祖，只要是能在语词形态上谋得一致，都可以说“我们祖上早就有了”，绝不去管该词是否成为一个固定组合，也不看该词在近代以后发生的词义变化，而这种变化又是发生在日本。这一倾向自二十世纪初以来至今不变，且越演越烈<sup>2</sup>。也就是说无视词义变化和词汇结构，单从字面上就做出判断，认定是中文已有的汉语词，主张所谓的“原创权”，这其中当然也不乏某种“大中华思想”在作怪。

我们在这里主要想从语言史上探讨一下这一问题的起因以及演变的脉络，并通过具体的例子来看看如何正确处理词源验证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以便在这一研究里达到一个基本的共识。

## 2. 「近代漢語」的劇增

大家知道日语的词汇按其来源是可以三分的：所谓日本固有的“和语”和由汉字音读而成的“汉语词”以及来自欧美的“外来语”。从历史上看，这三种词在日语里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阶段，我们可以从其演变的调查中得以确认。如图1所示<sup>3</sup>，日语固有的“和语”在奈良时代的『万叶集』（780）里几乎占百分之百，但随着时代的变迁逐步下降；而“汉语词”在日语里所占的比例则从十一世纪初的『源氏物語』（1000）开始逐

<sup>1</sup> 陈（2011.3）

<sup>2</sup> 民国七年（1918）《新名词训纂》（周商夫编，《明清俗语辞书集成》第三辑，汲古书院1975年）里就收有“出張、裁可、商標、目的、時計”等和制汉语，但却硬要配以汉文以示关联。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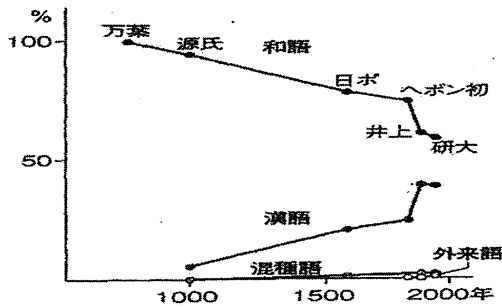
[出張]《周礼》天官掌次。掌凡邦之張事。《汉书王尊傳》供張如法。按日本以因公出外曰出張。供張之所曰出張所。

《王云五新词典》（1943）也是承这一手法。以致于后人更可以把跟词义完全无关的汉文作为出典，如释“科学”为“科举之学”、释“神經”为“神妙之经典”之类。

<sup>3</sup> 宫岛达夫「現代語いの形成」『国立国語研究所論集』（1967）

步呈上升趋势,经过『日葡辞書』(1603)一直延续到近代便有了一个飞跃:即从传教士平文编的『和英語林集成』(1867刊)到井上十吉编的『新訳和英辞典』(1909刊)的四十年间,汉语词的增长幅度(13.7%)几乎与自『源氏物語』至『和英語林集成』的八百年间的增长幅度(15.3%)相匹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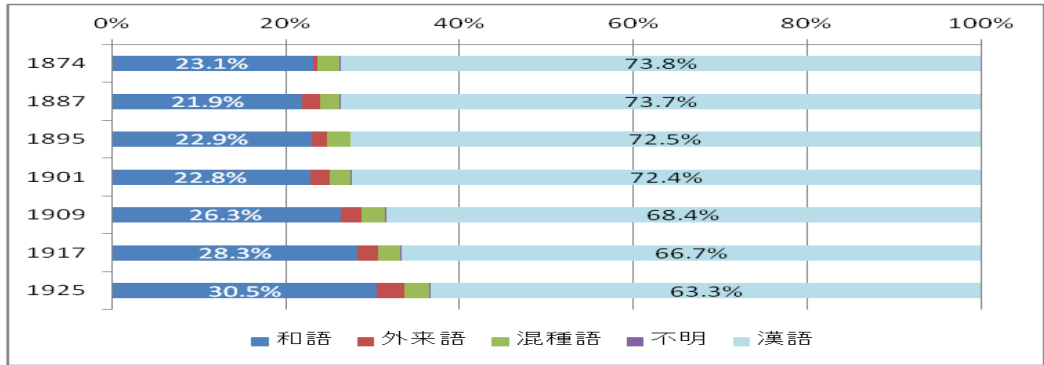
图1 日语中各类语种的比例变迁



也就是说,从历时的角度来看,我们首先就是要解释为何日语里的“汉语词”在近代会突然有这么一个飞跃,其结果是否影响到中文?

这种“汉语词”词在日语里的剧增曾被称作近代日语的一大特征,学界早在昭和三十二(1957)年就有池上祯造「漢語流行の一時期—明治前期資料の処理について」<sup>4</sup>一文,认为这种剧增宛如昙花一现,是明治初期的一时流行。但是,最近国立国语研究所研究员田中牧郎(2010)利用近代杂志语料库对明治·大正时期(1874-1925)的词汇进行调查,更为详细地展示了这一期间每隔数年的各种语种的分布情况<sup>5</sup>。如下图2所示,“汉语词”所占的比例(单词个数)在整个明治期间始终保持在70%以上的历史最高纪录,只是在进入大正时期以后才开始逐渐减少至60%。

图2 近代杂志语料库中的语种分布比率(单词个数)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明治期“汉语词”的剧增并非“一时的”现象,至少是横贯整个明治时期的倾向,加上大正时期(1912-1926),可以说这五十年间“汉语词”(单词个数)始终占据了日语词汇的60%以上。

### 3. “汉语词”剧增的时代背景

我们在说到明治时期(1868-1912)的日语转型时,“汉语词”的剧增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当然这种变化并非一夜之间就形成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之前的一个多世纪的语言状况当是其准备期间,因为

<sup>4</sup> 初载于『国語国文』昭和32年6月,后收录于『漢語研究の構想』(岩波书店、1984)。

<sup>5</sup> 下图表亦引自田中牧郎(2010)

说到近代,人们习惯以明治维新为起点,也就是自 1868 年起,这当然是政治史的概念。但也有人认为应该再提前些,将 1854 年作为近代的开始,因为那时美国佩里舰队逼临下田,导致了日本的对外开国(这点与我们把鸦片战争作为近代的起点相似)。而实际上,如果以对外关系为契机来考虑的话,特别是要注重到兰学(研究荷兰的学问)对日语产生的影响的话,那倒是可以以 1720 年的“禁书令缓和”为近代的萌芽期,因为从那以后江户幕府开始对外国书籍解禁,并选派青年直接学习荷兰语,到了 1774 年终于用汉文译出了第一本解剖学专著『解体新書』,从而开创了日本翻译西学的新纪元。所以,我们也有必要上溯到 1720 年左右来从以下三个方面看看“汉语词”在日语里的实际情况如何。

首先从思想史上来看,江户幕府是以朱子学为官学的,而在“近世前期儒学势力甚微,(略)进入近世中叶至后叶(18-19 世纪)才逐趋于繁荣。且这一走向一直延续到明治以后。”<sup>6</sup>正如学者所指出的一般,18 世纪以后便是儒学、汉学家们大显身手的时代,加之长年无战事,连下级武士们也放下刀枪开始念起四书五经来了。他们用日本独特的汉文训读方式来学习汉学的基础知识,同时又用朱子学对天地人的解释和世界观来武装自己的认识,为其后即将涌来的西学备下了可做比较的另一参照面。从语言史上来看,较之平安时代,日本近世以后的汉文训读愈发趋于简略,也就是读汉文时直接音读的比例增大,任何两个字以上的组合只要一经音读便可视为一词,以致从汉文中可以抽出大量的“汉语词”词,这为词的认定打开了绿灯。其结果便反映在『節用集』等辞典和解读各种汉籍的『字解』类之中,有了这么多的“汉语词”的储备,也就为即将到来的明治时代所涌现的新概念准备好了载体<sup>7</sup>。

思想史的另一方面也不容忽视,针对朱子学展开批判的荻生徂徕首先对以往的汉文训读表示不满,他认为这种解读方式无法真正理解汉文的本质,只有掌握同时代的中文才能与中国人同样理解朱子学并予以批判,所以他便跟长崎的中国人学「唐話」(当时的口语),并主张直接用「唐話」朗读汉文才能达到真正的深刻理解。这一做法实际上也是加快了“汉语词”的组合和认定,因为等于是将汉文完全音读了。另一方面,由于学「唐話」所需,白话小说作为口语教材得以流行,这对日本的近世文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也从中汲取了大量的新词新语一即一批新的「唐話」词汇得以补充到日语中去。

最后一个方面,便是随着兰学的兴起,日本人在翻译过程中需要参照中国已有的西学著作。因为日本的知识分子精通汉文,对十七世纪以来中国出版的汉译西书和十九世纪以来的英华字典等都可以采取拿来主义的方式直接利用,这种做法不光是汲取了新知识,并加快了对世界的认识,而且在近代新词新概念的导入上也为日本提供了一个新的源泉一直接采纳中国西学里的近代新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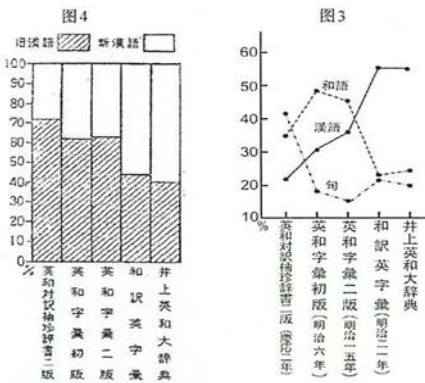
以上这三个要素均是来自中国的:一是传统经典;二是白话小说;三是汉译西书,这可以说是明治以前日语中的“汉语词”的基本状况,也是明治以后汉语词剧增的原动力。也正因此,19 世纪末去日本的中国人对日语并不感到陌生,极大程度上提供了阅读上的方便。当年梁启超的《和文汉读法》得以运用的基础也在于此,后来的“广译日书”在中国近代得以盛行的保障也缘于此。

除了上面说的构成“汉语词”词的三大要素以外,日本人独自创新的部分当然也是不容忽视的要素之一。所谓明治以后产生的“新汉语”这一概念浮出由此水面。比如,森冈健二(1959)的研究也是说明明治时期的“汉语词”的增加,他在调查英和辞典中的译词时,发现随时代的变化,英和辞书里收录的“汉语词”译词也骤然增多,如图 3 所示,最早的『英和对訳袖珍辞書』(1866)里还是用「和語」来翻译的为多,但到了『和訳英字彙』(1889)里,“汉语词”译词则一跃成为主流。而且这种“汉语词”译词的增加,又可以分为新旧

<sup>6</sup> 黑住真「漢学—その書記・生成・權威」『近世日本社会と儒教』ペリカン社,2003

<sup>7</sup> 陈(2005.6)认为:日本近代汉文训读的最大特征就是通过训法的简化来直接音读汉文,于是导致各种不同结构的复音节词得以生成为「漢語」,等于是「漢語」的认定条件上要大大缓于中文。

两个部分，它反映在图4所示的结果上，即明治以后的“汉语词”译词的成份中不断增加的显然是“新汉语”，到了『井上英和大辞典』（1915）时，已经占到“汉语词”译词的60%了。



这样一来，明治时期的“汉语词”剧增的原因，容易被认为是“新汉语”的出现而引起的，但应当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这种“新汉语”只是一种按“汉语词”使用时代的分法，其概念的不确定性和内涵的随意性是显而易见的<sup>8</sup>。如果仅以时代为准的话，也就是以为辞书中的新词采纳便等于是对“新汉语”的认可了，比如我们常听说的例子，平文编的『和英語林集成』第三版（1886）较第二版新增补了一万余条的“汉语词”，这一事实给人们带来的错觉是宛如这一万余词都是“新汉语”一般，其中正隐含着“汉语词”新词都是产生在明治以后等一连串的问题。

什么是“新汉语”？各自界说不一，宫岛达夫认为：

- A. 旧汉语（日）—明治以前の日本の文献に用例のあるもの
- B. 旧汉语（中）—A以外で中国の古典に用例のあるもの
- C. 新汉语 —A、B以外<sup>9</sup>

也就是说，“新汉语”是既不见于明治以前的日本文献，也不见于中国古典的词。这等于是强调日语境内的、明治以后的新词。但实际上在强调与西学接轨的时候，一般把“新汉语”理解为：

- a. 直接借用近代中文新词(如「電気、化学」)
- b. 用中文的古典词来对译外来概念(如「经济、社会」)
- c. 日本人独自创新的新词(如「哲学、悲劇」)

这里 a. 所指的就是上一节我们说的三大要素之一的、由 16 世纪以来的汉译西书和英华字典采录下来的汉语译词，如罗存德的《英华字典》在日本得到广泛的的应用的同时，其译词亦被大量采纳，这当然是包括在日语新词增加量里面的，也是被当作“新汉语”的；b. 则是拿中文古典词来对应外来概念，是需要通过具体细致的调查才能确定的；只有 c. 我们完全可以看作是名副其实的新创造的“汉语词”，实际又包括了日本兰学所创造的新词(如“盲肠、神经”等)。所以，上述宫岛的界定仅以明治时代以后为判断，无法涵盖此前日本与西方近代接触后的语词对应情况。

如果以 a. b. c. 三类当作“新汉语”的话，我们仍然无法解释近代日语的“汉语词”剧增是否缘于此。为何这么讲，是因为我们在解释这一现象时，本来应该调查明治时期某一年的数据（或一册书）的份量，在抽出所有“汉语词”后，首先要看所谓的“新汉语”（假若能按时代区分开汉语的新旧的话）所占的比率

<sup>8</sup> 参见陈（2011.3）

<sup>9</sup> 宫岛达夫「『共产党宣言』の訳語」『言語の研究』むぎ書房，1979

是多少？然后再展示出其内涵的分配，即 a. b. c. 三类所占的比率是多少。森冈的研究(图 4)只将“汉语词”分成新旧两种，没有给我们提供“新汉语”的内涵。甚至至今我们也拿不出一份这样的调查报告，总是拿“新汉语”这一概念笼统地阐述之，或以偏概全地拿出一部分的例子来扩大解释想像中的“新汉语”。

所以说，如果说“新汉语”是导致近代“汉语词”剧增的直接原因的话，那么我们就先解决“新汉语”的认定标准和其内涵，以及在总“汉语词”中所占的比率问题，然后按图2的年代推移看其增加的幅度。这样才能有确凿的证据说明“新汉语”在其中的作用和影响，否则便愈发演变出“新汉语词均是出自日本”这一认识，以致在议论什么是日语借词时也是概念和范围不清，只要是日本近代用的“汉语词”都一股脑地当作日语借词。因此，从这一点来看，阐明日语中汉语词的来源和属性，特别是被称作“新汉语”的内涵便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课题了。

#### 4. “新汉语”来源问题的几个误区

如上所述，作为日语词汇的一个种类，“汉语词”在其总数量上所占的比例随历史的推移而变化，我们对此已经有了个基本认识，但就其内部本身的构成和属性尚有很多不甚明了的地方，特别是有关“新汉语”源自何处这一问题，至今有以下三种说法甚为流行，已演变成一种日本独创“汉语词”的误解，也因此导致了诸多概念的混淆。

首先就是所谓的兰学译词的日本独创说。日本江户后期兰学发展兴旺，以『解体新書』（1774）为代表的、通过翻译近代西学而出现了许多新词·新概念（如“神经、软骨、盲腸”等），为日本走向近代化奠定了一定的基础，这些当然受到日本或海外学者的高度评价，但同时这种评价又陷入一个怪圈：凡是兰学资料出现的语词均为日本人的独创。过去学界里就已经出现过有关“病院”、“地球”、“電池”的争论，<sup>10</sup>结果是搞清了一点：日本兰学的发展过程中，来自中国的汉译西书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有关这点可见荒川秀清（1997）的研究），即我们上面讲过的“汉语词”构成的三要素之一，通过对汉译西书的研究，我们知道“緯度、經度、地平線、顯微鏡、羅針盤、直線、地球”等都是由这一途径进入到日语中去的。

再一个就是所谓的名人造词说的流传。人们过度相信日本具有代表性的近代启蒙家·思想家的言辞，如福泽谕吉、西周、加藤弘之、中村正直、森欧外、井上哲次郎等，只要是他们用过的语词，就全都认为是他们亲手创造出来的，并对此“传说”津津乐道，深信不疑。可是当我们一旦开始具体验证时，就会发现纯粹出自他们之手的“和制汉语”屈指可数，大多是先人已经开始使用过的，或是把先人的业绩归到这些名人身上。比如，过去一直认为是森欧外1901年通过翻译德语的nachricht而创造了「情報」一词，可事实上早在1876年酒井忠恕就已经把法语的renseignement翻译成「情報」了。

第三个误区是利用中国方面的研究反过来证明自己学说的正确。比如实藤惠秀的著作（1973）中就专设一节为〈中国人认可的日本语汇〉，将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人对日语借词的研究加以全面肯定，<sup>11</sup>在此之上扩充日语借词的范围，并在国内外展示这一“成果”，然后人们便以此作为研究的论据，导致出不少错误的认识。其问题所在是无论日本人还是中国人都说对方是这么认为的，应该没有错。基于这种轻信相互滚动，又拓展出新的空间，以致“借自日本”的语词数愈发累积起来。最后便引出中国人自己的“离开了日本借词

<sup>10</sup> 鈴木博「「病院」は和製漢語か」『国文学攷』86, 1986年6月；河辺弘「漢語「電池」の考証」『言語生活』306, 1977年3月；「地球」佐藤亨『近世語彙の研究』桜楓社, 1983年6月

<sup>11</sup> 中文里就这方面的议论也很活泼，继高名凱·刘正琰的《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后，王立达、谭汝谦、实藤惠秀等不断扩大这一借用词表。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汉语教研室编的《五四以来汉语书面语言的变迁和发展》（商务印书馆，1959）更是指出了〈反～、非～、超～/～者、～化、～性、～主義〉这种用词头词尾新造词的影响，其最终成果便是刘正琰等的《汉语外来词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中的892个词。

就无法说话”或“人文社会方面至少有七成以上的日语借词”这一论调,日方再全盘照收,不断添油加醋,中日两国之间相互都按自己所需来展开议论,表面上看好像是为文化交流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和依据,实际上是根本没有具体界定“新汉语”“日本借词”这些概念,回避了如何验证语词的来源这一根本问题。

从语言上看,是我们自己没有认真处理好这一问题。比如,针对日语里的新词分类,中文的理解是不对等的:

日文	中文
a. 直接借用中文新词	1. 本族词·本族新词
b. 用中文的古典词来对译外来概念	2. 日本回归借词
c. 日本人独自创新的汉语词	3. 日本原语借词

也就是说,除了承认c“日本人独自创新的汉语词”为3.“日本原语借词”外,其他两项实际上与日语是不对等的。王力《汉语词汇史》(商务印书馆,1993,153页)就中文的“本族新词”只举了“火轮车、公司、铁路”等7个词。而将“日本回归借词”扩大解释到日语的a b两类,这样等于是自己忽略了“本族新词”的实际范围和数量,想当然地扩大了“日本回归借词”的范围。然后在其“日本回归借词”背后却又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本是源自汉语”的意识。

日本史学家原田敬一对这一现象已经指出:“我们过多地强调了日本吸收消化欧美文化,创造和翻译新词,并将之输出给中国、韩国等汉字文化圈内的现象,只要看看汉译《万国公法》(1864)中的“遗产、军费、权利、公库、外交、财源、离婚、自治、自主、司法、野蛮、责任”等仍在现在日语里运用就会明白,文明和文化的交流是呈“双方向性”的。”<sup>12</sup>我们应持有这一观点。比如“人民”一词就是《万国公法》中的译词,早早就传到了日本。拙稿也曾通过英华字典的细查,举出“法律、领事、议会、保险、医学、必要”等六十八个词,实际上是经由中文传入日语的,并非《汉语外来词词典》所认定的源自日本的词。<sup>13</sup>这些都是强调日语直接借用中文新词的事实,只是我们中文自己对之认识不足而已。

但是,仅强调语词出自本身或许不无重要,因为实际上有很多词是从中文进到日语后,才赋予新的意义,并组合成一个固定词组的。

比如“民主”一词是通过《万国公法》传入日本的近代新词,日本将之视为a类;而中文将之视为第2类。19世纪英华辞典《英华萃林韵府》(1872)中将之对译为“republic民主之国”。这一用法当然也被明治时期的日本知识分子所接受,津田真道的『泰西国法論』(1868)就有“平民政治 一名民主の国”的用法,西周的『和蘭畢洒林氏万国公法』(1868)一书里也用了中文的“民主之国”“民主国”来表示republic的概念。如:

此王禮方今ニ在リテハ諸国其君主トシテ帝若クハ王若クハ大公ヲ戴ク者ニハ皆是ヲ帰シ併ニ民主ノ国エモ是ヲ帰スルヲ以テ常習トス(第十六節)

但同时,西周的『百学連環』(1870)中又有以下用法,于是马上就有人断定“民主”一词是他翻译的词。

14

此政体なるものに二ツあり。一を Monarchy (君主の治)とし、一を Democracy (民主の治)とす(二・下)

<sup>12</sup> 『シリーズ日本近現代史3 日清・日露戦争』岩波新书,2007

<sup>13</sup> 陈力卫「近代日本語における中国出自のことばについて—英華字典・漢訳洋書を通して」『アジアにおける異文化交流』明治书院,2004

<sup>14</sup> 实藤惠秀『中国人日本留学史』408页(增补版,くろしお出版1981)和《汉语外来词词典》241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都采用此说。

但实际上,这显然是援用了汉译《万国公法》里的用法。也就是说日本自己首先是拿“共和政治”来对译 republic 的,但自从中国的“民主 republic”进入日本之后,起初便形成了一种对应英文概念的类义关系,然后才逐步将两个词分别承担了 republic 和 democracy 的意思,而实际上,「民主主義」这一概念在日本语境里的形成加快了这一步伐,同时将具有新义的“民主 democracy”传回中国,以致二者完全独自分担英文的两个概念。所以,我们看日本在近代译词方面所起的作用,首先就是为词义变化提供了丰富的土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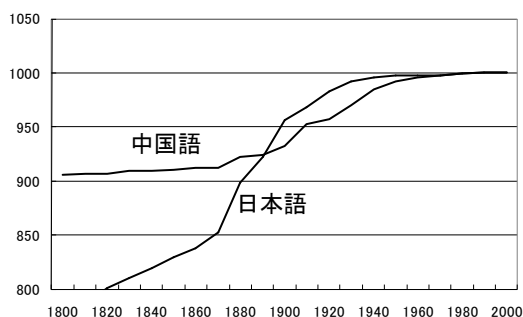
再举一个「愛人」的例子。如果强调出自的话,那当然是可以追溯到中国古典《礼记》上去,“敬天愛人”之义作为儒教的基本思想频繁出现,平安时代就已传入日本。但是到了近代,日本在与西方文化相接触时,拿这个既有的「愛人」改变其结构,用日语里常见的偏正结构“愛する人”来作为 Lover, Sweet heart, Daeling 的译词,于是便使之带有了「恋人」的意思。这一新义随后马上便被带回到中国,1920 年代不管是中国还是日本都是用同一意思,即「愛人」=「恋人」,而中国到了 1930 年代以后便用于男女之间的互相称呼,进入 1950 年代,则更是在男女平等的口号下,将“爱人”这一词用于配偶者之间的称呼了。也就是说古文中的意思和现代意思的转换是先在日语语境中形成的。<sup>15</sup>

从上述两例可以看出,我们应该重视日语中的词义变化和语词构造的转换,也就是要阐明日语语境下的语词过滤机能,这正是词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文学、小说、精神、艺术、自由、思想”这些出自中国的汉语词,其本身所担负的外来概念随着时代也在变化,汉字词的形式只是一种外表的装饰,它不断地掩盖和包容了英文原文词义的实际变化,也就是说,适应每个时代的外来概念的正确理解是源自日本还是源自中国,只有搞清这点才能确定该词是否是作为近代新词而形成的。单是确认作为符号的汉字表记与英语概念的最初结合尚不足以证明近代概念的形成,<sup>16</sup>这也是为什么要从概念史方面重新审视“汉语词”译词的意义所在。

## 5. 词源调查的方法及其局限性

检验上述“新汉语”的方法之一就是具体考证语词的历史,通过比较中日两国语言的最早使用例来决定是源自中文还是出自日语。比如,宫岛达夫(2010)分别抽出日中两国的 1000 条高频率词,通过比较这些词在辞典里出现的时期,来看各自语言的现代化进程。下图 5 所展示的结果正可以看作图 1 近代部分的扩大版,这里强调了两点:一是“中文的现代化进程的步伐本来早于日文,但在二十世纪初被日文超过。”二是“中文随后又受日文的影响并行增长,加快了现代化的步伐。”前者印证了日语中“汉语词”词剧增的事实,后者则反映出近代中文新词受日语影响的一面。

图5 日中语言的近代化比较



<sup>15</sup> 如果加上韩语,这个词现在是意义三分:中文表“配偶者”;日文已沦为“不正当关系的男女”,只有韩语保持了最初日语的“恋人”之意。

<sup>16</sup> 陈(2004.9)

作为日语的高频率1000词中,有416个“汉语词”,其中128个为日中同形词。宫岛对这些词用两国的历史语言词典(『日本国語大辞典』和《汉语大词典》)加以比较,发现其绝大部分均是早就出现在中文里的词,只有10个词是日语的用例早于中文的,即:「简单、国际、参加、时期、实现、集中、全部、内容、表现、问题」。而实际上这10个词也多是中文早已有之,只是现行辞典(如《汉语大词典》)没能详尽收录而已。如果检索其后出版的《近代汉语大词典》(中华书局,2008)或《四库全书》的电子版,就会发现“时期、实现、全部、内容、表现、问题”等在中文里已经有了早于日本的例子,只是没有反映到词典里去。通过这道检验程序后,暂且可以确定的只有「简单、国际、参加、集中」这四个词可以说是在日语里形成的,也即所谓当作“和制汉语”输出到中文里去的。

这种“汉语词”的词源调查结果表明128个日中同形词中只有4个词是纯粹的日本独创的,即我们上面说的c.类,从比例上来看只占其日中同形词的3%。但我们也发现这种词源判断过程中的最大问题是受资料的开拓程度而左右的,如果按最初的词典来判断,那就会得出10个词,即近一成的词为“和制汉语”的结果。所以,弥补这一差距只能是利用更多的材料来进行验证,同时伴随着电子文本的语料库的完善,才能够做出更为精确的判断。

这里的调查目的明显是在追求哪些是日文独自创造的词,它比笼统地称为“新汉语”要鲜明得多,如果将“汉语词”两分的话,就是澄清哪些是中文词?哪些是日文词?

野村雅昭(2010)也是使用这种词典用例的时代差对日语里的“汉语词”词的出现时期进行了调查,他把范围扩大到“汉语词”双音节的基础三千词上,得出了图6的结果。即按“汉语词”最早出现的时期来做时代划分,结果发现:第I、II期几乎都是源自古汉语文献的词(如“意见、音乐、观光、同盟”等);而自第III期的江户后期始,便包含了兰学创造的「漢語訳語」(如“手术、动脉”等),也就是开始出现日本独自的“新汉语”。

图6 「基礎漢語」三千词的出现期分布(野村雅昭)

时 期	词数(百分比)	词 例
I 奈良·平安·镰仓	927 (30.9)	意見 宇宙 音楽 学校 季節 元気 政治 世界
II 室町·江戸前期	374 (12.5)	安心 意外 観光 元旦 出席 早速 真剣 同盟
III 江戸后期(1720-)	362 (12.1)	英語 社会 幸福 手術 制造 地球 動脈 郵便
IV 明治(1868-)	1167 (38.9)	委員 温度 會計 鉾物 资金 推理 選手 発電
V 大正·昭和	165 (5.6)	沿線 空港 原油 公約 知性 都心 密輸 録音
計	2998 (100.0)	

野村自己是这样解释的:“此表最大的特徵便是最初出现在第IV期日本明治时代的词占大多数(38.9%)。恐怕这三千词的相当部分均是在第III期江户时代后期的某一时段才开始出现的。即从幕府末期到明治时期可以称作日语词汇的变动期,此前几乎都是借自中文的“汉语词”,而自这个时期起日本自己创造的“和制汉语”开始增多。另外,亦可做出一种推测:江户后期以后诞生的语词中有不少也输出到了中国。”<sup>17</sup>。

这一调查结果也印证了我们前面提到的以1720年为近代的转折点以及明治时期“新汉语”的增加,同时也展现出基本“汉语词”三千词在各个时代的大体上的出现分布。但是,与上述宫岛的研究相同,仅靠辞书的最早出现的例子来判断其产生的时代会有很大的误差,江户后期的第III期加上第IV期共有1529个词,这一数量经过更多的材料验证后,必然会有进一步修正的可能性。在此基础上,我们才有可能得出日中同形词的抽出后的a. b. c.三类的正确比例,以及各自的认定及其内涵,也才能判断出哪些词作为日语借词后来

<sup>17</sup> 野村(2010) P66



进入到中文里去了。

单纯依靠辞书来验证词源有其局限性,拙稿(2004)曾对各个具体汉语词的词源问题有过一段评论,指出单靠辞典来判断语词的出处带有很大的危险性。“如果判断该词为中文成立的话,至少要仔细调查传教士等西学材料,然后找出与日本的关联,在确认两者的影响关系后才能在某种程度上给出一个答案。(略)无论哪种可能,都是以资料调查的精确程度为前提的,所以在调查每个词时所花费的精力和时间是必不可少的。从这一意义上看,该领域的研究中的资料尚不完备,目前只凭借着『日本国語大辞典』和《汉语大词典》『大漢和辞典』等辞书来构筑词史未必能引导出正确的结论,反倒是应该对这些词典的过分依赖鸣起警钟。”<sup>18</sup>

这就是说,单单比较一下中日双方的辞书用例就做出源自日本或中国的判断,这一方法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带来各种误解。这首先要归结于辞典本身的问题,『大漢和辞典(修订版)』和《汉语大词典》所收的近现代词不足,特别是后者“既不使用西学资料和英华字典,在词目和用例上也无视或轻视近代语词。”<sup>19</sup>所以可以想像依照这类词典得出的结论是有很大偏差的。

最近,日本的『幕末・明治初期漢語辞典』(佐藤亨,明治书院2007)和中国的《近现代辞源》(黄河清编,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6)相继出版,分别弥补了各自辞典在近代语词部分的不足,亦可以说有了一定的进步。比如,以下两例我们用《近现代辞源》和『日本国語大辞典(第2版)』做一比较,会发现中国(《近现代辞源》)的例子要比日本(『日本国語大辞典(第2版)』)出现得早,按通常的看法便会将其认为是源自中文的语词:

【病例】中国 1942 / 日本 1959『海辺の光景』安岡章太郎「现在ではアメリカでもっと多く見られる病気で」⇒〈父母乃務 家庭育児〉三谷周策著(鍾美堂,1905)

【茶話会】中国 1901 / 日本 1909『田舎教師』田山花袋「大君の目出度い誕生日は茶話会では収まらなかった」⇒珈琲会(茶話会)〈処女のつとめ〉ダブイヂス著、阪田孫四郎译(博文館,1894)

但是,如果再仔细调查的话,正如箭头⇒后面的例句所示,我们可以上溯到其他文献里找出日语的用例。这也就是说,『日本国語大辞典(第2版)』虽说是日本最大规模的历史语言词典,但在用例采集方面明显显露出偏重文学的倾向,如上述两例均是取自著名作家的作品,但实际上却并不是最早用例。同样,宫岛达夫也举过“術科”一词,指出《近现代辞源》引用了《日本国志》(1890)、《遊历日本观察兵制学制日记》(1899),而『日本国語大辞典』却只引了阿川弘之「春の城」(1952)的例子。“应该从小说以外的军事方面的文献中寻找更早的例子,这显然是『日本国語大辞典』过于偏重文学方面的表现”。实际上我们往上溯细查一下,也就会发现“術科”一词早在1890年的『歩兵射撃教範』(小林又七著)里使用了。<sup>20</sup>

另外,《近现代辞源》里早有了中文的使用例,而『日本国語大辞典(第2版)』却只列词目给不出例句,比如,在《近现代辞源》里下面四个词的最早出现年分别为:

【华氏温度】1942 / 【基肥】1925 / 【不成文法】1903 / 【儿童团】1942

可是『日本国語大辞典(第2版)』居然举不出例子来。如果照以往的处理,这四个词当然要算作中文影响日文的例子了,可是再通过数据库等往下仔细查一下就会发现日本的文献里均能找出比《近现代辞源》更早的用例:

\*「摂氏華氏温度比較表」『鯷油漬缶詰製造書』伊谷以知二郎、松尾靈彦著,水産書院,1907

\*「肥料の種類-石灰と稲作-施肥上の原則-施肥の時期-稲の成育と施肥-基肥と補肥」『稲作改良論』

<sup>18</sup> 陈(2004)

<sup>19</sup> 陈(2011.6)

<sup>20</sup> 同上注

横井時敬著, 博文館, 1904

\*「成文法及不成文法より生ずる一般被治者の利害」『法律社会之現象』河野和三郎著, 吉岡書籍店, 1888

\*「家族兒童團規約貯金」『直江津郵便局誌 御大典記念』直江津郵便局, 1916

这就说明了一点:在词源判断上的失误多数是由日语辞书编纂的问题所引起的,即在用例采录方面还尚欠努力。<sup>21</sup>反过来看中文也是一样,《汉语大词典》作为历史语言词典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sup>22</sup>

其结果,我们可以看出这种依靠辞书所做出的词源判断上的错误多是起因于资料的开拓和调查的不足,欲以辞书用例来建构具体词史总是伴随着材料上的脆弱性,往往会被导向不同的方向。

这种近代词源研究的新的取向,我们还可以关注宫岛达夫的「日中同形語の発掘」(2011)一文,过去一般是拿“学校”“科学”这类日中同形词来做对比研究的对象,但他以为象日语用「テレビ」、中文用“电视”这种完全分化的例子也应引起我们的注意,即“电视”这个词在过去某一时期里曾作为译词在日语里用过,而后才进入中文,所以它是某一时期的同形词。象这类的例子应该多加发掘,他拿吉泽典男·石绵敏雄编的『外来語の語源』(角川书店1979)作为基础材料,看当时日本在翻译外来词时用哪些汉字词,然后从中抽出日中同形的汉字词来与《近现代辞源》的例子做比较,看看哪些词是在日本译出的“和制汉语”。这样细查一遍就会发现『外来語の語源』在双重意义上对发掘日中同形词有着重要的作用。第一,可以发现现代日语中已经不用,但中文里还在用的「滑翔機、電視」等;第二,可以给《日本国語大辞典》里那些只列有词目却无例句、或例句出现年代偏新的词(如「菜单、私刑」等)提供更早的例句。<sup>23</sup>这就是说,「滑翔機、電視」这两个词本身是出自日语的,只是日语后来采用了英语外来词,他们放弃了「漢語訳語」通过英和词典等被我们采纳了而已。这类例子找下去,可能还会有很多(诸如“排球、篮球”之类)<sup>24</sup>。

随着中日两国语料库的健全和完备,给我们在词源研究方面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援,但中文语料库中多是按图索骥,只要是同一词形就都被算作一例,这其中需要我们花力气做去伪存真的工作。比如用《四库全书》的语料库来检索,出现三四十条的例子几乎都不以为证,只有到了上百条才比较有把握地验证出该词的存在和使用。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我们有些人爱拿文献中出现的个别例子来当作一个既有的概念确定该词的使用年限,即不去管它在当时是否已经成为一个固定的组合(成词与否)。

## 6. 中日语言交流的历史分界

辨明日语中的“汉语词”出自何处,多是应最近兴起的概念史研究的需求,当近代欧美概念传入东亚时,日中两国是怎样对应的,相互之间有过哪些交流,特别是日本翻译的“汉语词”词通过什么渠道传入中国的?这一课题始终围绕着中日言语交流史所展开,必然要追溯到语词的最早出处的问题。同时,既然是中日语言交流史的一环,就要涉及到中文影响日文的时代下限以及日文进入中文的上限这一问题,沈国威(1998)曾把中国“新汉语词”的形成分为5期:

- |      |           |
|------|-----------|
| ①准备期 | 1807-1840 |
| ②发展期 | 1840-1860 |

<sup>21</sup> 同上注

<sup>22</sup> 陈(2004.10)

<sup>23</sup> 宫岛(2011)

<sup>24</sup> 1926年日本已多用“排球、篮球”,昭和3年(1928)『三省堂英和大辞典』里有汉语译词「排球」:

Volley=ball 排球 [高イ網ノ各側ニキル一団ノ戯手ガ互ニ地ニ落サナイヤウニ球ヲ飛ベシ合フ遊戯]  
其后日语开始用片假名的音译词“バレーボール”,汉语译词反倒被忘却,为中文所利用。

③官方翻译期	1860-1880
④停滞期	1880-1895
⑤日语导入期	1895-1919

从中日语言交流史来看,①②③期是日语借自中文的时期;而第⑤期可以看作日语进入中文的时期;第④期则两种可能都有。也就是说中文影响日文的时代下限可以定在 1880 年左右,这一点我们在日本人翻刻中文西学文献以及购买江南制造局出版的书籍调查中得以印证;<sup>25</sup>但日文进入中文的上限是否也可以以 1880 为界还有待进一步的论证,一般都是以甲午战争后的 1895 年为转折点,日语才开始影响中文。

为了适应概念史研究的所需,我们有必要就各个语词进行详尽的描述,也就是该词是如何经由日本转到中文里的。语言史上的积累可见李汉燮的『近代漢語研究文献目録』(東京堂出版,2010年2月),至今为止有哪些词别人已经研究过,有过多少研究都由此一目了然。而且,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中文语境里也开始关注近代语词及近代概念的形成和中日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陆续已出版了以下几种专著:

- 香港中国语文学会《近现代汉语新词词源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1
- 冯天瑜《新词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中华书局,2004
- 周振鹤《逸言殊语(增订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 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香港中文大学,2008
- 沈国威《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汉字新词的创制、受容与共享》中华书局,2010
- 庄欽永·周清海《基督教传教士与近代汉语新词》新加坡青年书局出版,2010
- 黄河清《近现代辞源》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

这其中有很多是利用中国近代传教士相关的资料来阐述和论证“汉语词”的词源的,参照这些成果,我们需要重新修正日本近代“汉语词”的一些词源,也可以利用这些材料建构具体词史。只有充分利用中日两国现有的丰富资料,才能对近代“新汉语”到底有多少,其词源的依据在何处这类问题做出一个基本的判断,或者说建立一个基本框架,给出在做这一判断时所需的手续和测验点,这样我们才不会趋于主观,过于依赖自己手中的材料来下结论。当然,如果仅仅专致于抽出日本人独自创造的“和制汉语”的话,我们可以先拿出一本描述各个词史的辞典作为这一研究的开端。

#### 参考文献:

- 荒川秀清『近代日中学術用語の形成と伝播』白帝社 1997 年
- 実藤惠秀『近代日中交渉史話』春秋社,1973 年 7 月
- 沈国威「新漢語研究に関する思考」『文林』32 号,1998 年
- 田中牧郎「雑誌コーパスでとらえる明治・大正期の語語の変動」『国際學術研究集会 漢字漢語研究の新たな次元 予稿集』国立国語研究所,2010年7月
- 陳力衛「国際シンポジウム〈近代語の語源研究とその周辺〉についての報告——《近現代辞源》の評を兼ねて」『東方』364号,東方书店,2011年6月
- 陳力衛「“新汉语”とはなにか—漢籍出典を有する語を中心に」『言語変化の分析と理論』坂詰力治編,おうふう,2011 年 3 月
- 陳力衛「新漢語の産出と近代漢文訓読」『日本学・敦煌学・漢文訓読の新展開』汲古书院,2005 年 6 月

<sup>25</sup> 陈力卫「明治初期における漢訳洋書の受容」『東方學』第 99 輯,2000.1。中文版见于〈江南制造局的出版物在日本的传播和利用〉《历史上的中国出版与东亚文化交流》复旦大学历史系·出版博物馆编,百家出版社 2009.11

陳力衛<《漢語大詞典》在处理日语借词上的几个问题>《日语研究》第2辑,商务印书馆,2004年10月  
陳力衛「近代語と中国語」『近代日本語研究』日本語学臨時増刊号,明治書院,2004年9月  
陳力衛『和製漢語の形成とその展開』汲古書院,2001年3月  
野村雅昭「現代漢語データベースからみえてくるもの」『国際學術研究集會 漢字漢語研究の新次元 予稿集』国立国語研究所,2010年7月  
森岡健二「譯語の方法」『言語生活』1959年12月  
森岡健二「開化期翻譯書の語彙」『近代の語彙 講座日本語の語彙6』明治書院,1982年  
宮島達夫「語彙史の巨視的比較」《汉日语言对比研究论丛》第一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宮島達夫「日中同形語の发掘」国際シンポジウム「近代語の語源研究とその周辺」関西大学,2011年3月19日